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四卷)

上

「英」迈克尔·曼 著
郭忠华 徐法寅 蒋文芳 译

全球化 (1945—2011)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非虚构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四卷)

上

「英」迈克尔·曼 著

郭忠华

徐法寅

蒋文芳 译

全球化 (1945—2011)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4,
GLOBALIZATIONS, 1945-2011

MICHAEL MANN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四卷)

全球化 (1945—2011)

上

中文版序言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第四卷将我对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考察带向终点。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760年到1914年，内容具有很强的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一时期的各种帝国。我因此从第三卷开始关注现代帝国，并且不得不在开头部分回溯很长一段时间，详细讨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帝国。然后，第三卷所叙述的故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作为结束。为写作第三、四卷，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远未达到全面和彻底的程度，因为有关现代时期的相关资料已达到极其丰富的程度。如果我的叙述引用了什么错误的史料，或者借鉴了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或采纳了一个可能具有高度有争议的观点，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最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是有关东亚的章节，因为我无法阅读中文和日文的文献。

但我的叙述不仅仅是经验性质的，毋宁说是依据社会学理论构建起来的，这些理论模型从我调查的大量经验数据中提炼而来。我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与前面两卷一样，我的叙述结构主要依赖于四种相互作用的权力来源，其中每一种来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这四种来源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那些能够行使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生产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国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会权力。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是“马克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有时也使用一种三重分层模

型，即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一标签有些道理，并且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与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我不赞同韦伯的是，包括现代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许多依赖于其他大国提供保护的现代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那些国家的军事权力也没有有效地渗透在自己的领土上。更为晚近的例子是当代“软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军事权力比其在世界经济和环境等“软”问题上行使的权力要少得多。中国从某种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组织化的致命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家的机构和法律(政治权力)。我相信，我是唯一把历史和社会看作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来加以分析的理论家。

尽管所有四种来源常常互相绞合在一起，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所以彼此之间最终是一种“正交”(orthogonal)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约为另一方。因此，我尽管在第三、四卷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不论这种观点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我尽管承认意识形态在这些时期的重要性，我坚持拒绝唯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所谓“文化转向”中非常普遍。在军事权力方面，我纠正学术界常常忽视这一方面独立性的相反趋势，直到最近20多年，战争和武装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视。我认为，晚近对于军事权力不断增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对我的影响。对于政治权力，我强调民族国家将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断强化的“牢笼”观点。我在这两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种来源所构成的权力网络在现代时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时也强调，重大社会制度是由这四种权力来源所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这一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主要权力制度的发展。

这不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简洁、普遍解释的“硬”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并非简单明了，毋宁说它们极为凌乱，但我的确希望提

出一种通常所谓的“中层”理论。当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这一点，那就必须阅读这两卷，你会在其中发现帝国主义兴起的理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包括大萧条的灾难)的理论、福利国家兴起的理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 20 世纪恐怖战争的理论。

在这两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说的“权力的前锋”，即关注每一时期权力最大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起源对于后来如何成为强国极为重要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关注欧洲和美国，而对衰落中的中国只是简单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则很大的不同，它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关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随后导致其崩溃的战争，讨论了两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受尽凌辱的中国和沦为殖民地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成为了强国。就中国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国的不完全复兴进程，这一进程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所突然中断。对于日本，我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曾经倡导过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主张。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发展成为高度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地方军阀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卷的前面章节，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包括东亚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关革命的讨论在第四卷“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一章中将达到高潮。当然，我在第四卷还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

我很高兴我的许多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国的演讲，并且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繁荣。作为西方人，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中国为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希望本书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绵薄之力。

迈克尔·曼

2014 年 10 月 21 日

目录

中文版序言/1

第一章 诸种全球化/1

第二章 战后的全球秩序/16

第三章 1945—1970年战争和冷战中的美国：阶级冲突/49

第四章 美国的公民权利与认同斗争/90

第五章 冷战中的美帝国：1945—1980/116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衰落：1970—2000/167

第七章 苏联方案的失败/229

第八章 毛泽东主义方案的改革/278

第一章

诸种全球化

我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史研究的第四卷，也即最后一卷，将涵盖 1945 年以来的历史。本卷将聚焦于战后全球秩序的三大主要支柱：资本主义（以及苏联的命运和中国的转型）、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作为世界仅存帝国的美国。这一时期所有这三大支柱的最明显特征莫过于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一个被广泛称作全球化的过程。我在第三卷中用复数的形式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以此表明正在行进的全球化不止一个过程。我在所有四卷著作中始终强调，人类社会是围绕着四种独特的权力资源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四种资源之间彼此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我所说的权力的 IEMP 模型）。但它们是一些理想类型的权力资源，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其纯粹的形式，它们围绕着社会的三大主要宏观制度而集结在一起，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帝国。这一时期主要的新型意识形态都是围绕人类试图理解那三大宏观制度而形成的。

让我首先对这四种权力资源做一个简短介绍吧，更为详细的阐述可见之于所有前三卷的第一章。权力就是使他人去做即使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为达到这一目标，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与他人进入到一种彼此合作和冲突的权力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催生了社会。因此，权力既可能是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聚合性关系——通过他人而形成的权力(power through others)，也可能是分配性的关系，即通过某些人支配其他人而形成的权力。两种权力都存在四种主要来源：

(1) 意识形态的权力来源于人类寻找生命终极意义的需要，来源于与他人分享规范与价值以及参与审美和仪式实践的需要。意识形态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其运动的力量则来源于我们无力在我们的所知世界中达到确定性。我们在各种隔阂和不确定性之间注入形形色色的信仰，这些信仰本身并不能被科学地证明，但却表征了我们怀有的希望和恐惧。没有人可以证明是否存在上帝，抑或可以证明人类将走向社会主义或者伊斯兰主义的未来。在旧的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不再有效、新的意识形态又尚未形成效力的危机关头，意识形态变得尤为必须。在这一时期，我们最易受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权力之影响，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某种似是而非而又无法证明的有关这个世界的理论。意识形态权力总体上是对其他三种权力源泉之发展的反应，但随后形成自身的特有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很不均匀，当我们需要解决没有预期到的危机的时候，它猛然变得重要，但在其他一些时候则通常不那么重要。在这一时期，与父权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环保主义等世俗意识形态一样，复兴的宗教意义体系也占有一席之地。

(2) 经济权力来源于人类提取、转化、分配和消费自然产品的需要。经济关系之所以强大有力，在于它将劳动力的集中动员与更广泛的交换网络联系在一起。当代资本主义把整个地球作为资本、贸易和生产链的竞技场，其权力关系同时渗透在绝大多数人最例行化的日常生活中，侵占了我们至少一半的清醒状态时间。与军事权力不同，各种经济生产的社会变迁很少是迅速的或者突变式的，毋宁说它们是缓慢的、累积性的，但最终影响深远。现代阶段经济权力的最主要组织形式是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构成了本卷论述的核心。资本主义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工具都转化成为商品，包括资本、劳动力、产品和消费在内的所有四种主要市场彼此进行贸易竞争。晚近以来，资本主义已成为最为持久和有利的权力组织，它造就了大部分的技术革新和环境蜕化。

(3) 军事权力。我把军事权力界定为这样一种社会组织——集中而毁灭性的暴力。“集中”意味着动员(mobilized)和聚焦(focused)，“毁灭”则意味着“致命”(deadly)。《韦伯斯特大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把“暴力”界定为为达到伤害或者虐待(abuse)的目的而使用武力，通常表现为一种剧烈、残暴、疯狂和毁灭性的行为或者力量。军事权力因此是集中的、有形的、剧烈的和致命的，它生杀大权予夺，如果你敢于抵抗，军事暴力的持有者就会说：你该死。由于致命的威胁是令人极度恐惧的，军事权力因此催生恐惧等某些特殊的心理情感和心里征兆，就像我们将面临疼痛、肢解和死亡等情形时那样。军事权力通常为武装部队在国家间战争的状态下所致命地使用，尽管本卷同时还将讨论准军事组织、民兵以及恐怖主义等力量。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存在着明显的交合之处，尽管它们通常表现为不同的组织形式、体现为社会中不同的等级。

(4) 政治权力体现为对社会生活的集中和领土化管理。政治的基本职能在于在特定的领土范畴内提供秩序。我这里不仅从韦伯那里获得灵感，他把政治权力(或者“派系”)归属于各种类型的组织，而不仅仅是国家，而且从诸多政治科学家的治理概念那里获得灵感，他们把治理看作是由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NGO)和社会运动在内的不同团体所实施的活动。我倾向于把包括地方、地区以及全国层级的政府在内的国家看作是“政治”的，因为只有国家才具有集权—领土化的形式，可以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个人制定权威性规则，其他非政府组织(NGO)或者企业都不具有此种形式。我可以从某个 NGO 或者企业中辞职，并因此藐视其规则，但我必须遵守我所居住国家的规则，否则将招致惩罚。政治权力网络通常以集权化和领土化的方式得到管理和协调，与其他三种权力资源相比，政治权力因此更加地域化，国家所涵盖的范围通常比意识形态更小、更加紧密。

因此，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涉及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之间的独特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伸延。具体地说，1945年之后，全球化意味

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传播，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意味着军事打击范围的延伸，意味着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一开始具有两个帝国，后来则只剩下一个。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大部分有关全球化的讨论都令人兴味索然，除范围之外，全球化并不具有特殊的意涵，除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一点之外，全球化不会做任何事情。全球化自身不能由于人类社会的某种状态而受到赞扬或者指责，因为它仅仅是社会权力资源扩张的结果。这一点也反映在全球化没有催生有关社会的创新性理论这一点上。社会科学家以前提出的理论主张，社会与民族—国家相等同，现在它们已在地域范围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这一点通常为某些沽名钓誉的社会科学家所主张的社会已发生根本性转型观点所掩盖。极端全球化者主张，全球化已导致根本不同的社会类型。以一种稍带轻蔑的口吻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看作是全球化的胡说(globaloney)。然而，全球化的某一个维度的确是转型性的：那就是人类行动扩张至全球，然后又返回到我们自身。这是一种回龙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即人类行动撞击到地球的极限，然后它们又反过来重重地撞击着行动者自身，并使他们发生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可能以两种方式发生。方式之一是战争的武器已经发展得如此致命，以致核战争或者生物武器战争可能摧毁整个人类文明。就如我在第二章将要谈到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这样一种威胁之下。方式之二尽管还不那么具体，但却已可预测：以燃烧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经济扩张提高了有害排放，这一点也可能使人类文明最终难以为继，这一问题我将在第十二章加以讨论。马克思主义者预测了第三种可能的回龙镖效应，那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最终将遍及全球，这将使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再可能，并由此形成重大危机。但倘若要分析这些可能的前景，我们就必须从经济和军事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赋予全球化内涵，是它们形成了回龙镖效应，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赋予全球化内涵的最流行方式莫过于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其基本驱动

力。唯物主义者把全球化看作是由资本获利的经济压力所驱动，这一压力导致了使生产链和市场能够全球扩展的通讯技术革命。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现在只有中国仍对全球化半推半就(我将在第八章对这一点加以讨论)。经济学家有时以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或者商品价格的全球趋同度(有时还加上劳动力迁移的指数)来衡量全球化水平。通过这些指数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全球化在17—19世纪早期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但1860—1914年间突然高涨，紧接着是一个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萧条与战争相混杂的滞涨时期，一直到1960年才出现复苏和第二轮高涨(O'Rourke & Williamson, 1999)。正是第二个高涨阶段催生了我们当今最为全球性的经济。既然现在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和移民指数只比1914年之前的那一段时期稍高，情况说明，实体经济中的绝大部分不能仅通过统计数据来得到衡量或者计算——尽管国际贸易额的确容易得到测量——因为所得比例(resulting ratio)总是会呈向上偏误(biased upward)。在第二个高涨周期，金融资本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即时性地流动，同时，生产链也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延伸。所有这些将在第六和第十一章加以讨论。

经济学家通常把全球化界定为市场的全球整合，这种观点忽略了战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其他主要推动力。他们还暗示，全球化只发生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但正如本卷将要表明的，衰退时期同样存在全球化。人们通常把1914—1945时期当作全球化衰退的阶段，而且那一时期确实存在国际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我承认那一时期的经济整合出现了下降，经济分裂变得全球化了。但那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同时还存在着我们所说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几乎使全世界所有国家无一幸免的大萧条。这是一个分裂的全球化阶段(disintegrating globalization)。与此类似，1970年代以来的停滞导致了各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但这些政策又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大衰退。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更加全球性的经济危

机——气候变化。增长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与此同时，危机也越来越变得全球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增长抑或衰退的故事，因为每一个人类成功的故事都伴随着严重的问题，每一次重大灾难中也都隐含着一线生机。经济增长破坏了环境、耗尽了自然资源，而每一次世界大战却都催生了更多的公民权。

全球扩张还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意义一点都不会比全球化少。晚近 19 世纪的高涨将北欧、西欧及其殖民地整合成大西洋经济，同时强化了它们与世界其余地方的差别。1960 年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涨将南欧、东亚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地方——但不包括非洲和中亚——整合在了一起。我们在总结全球化的时候不能不顾其地区差异或者其准确的时间性，全球化在何时、何地得到扩张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经济学家总是企图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FP)来分析全球经济扩张，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被拆分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力，以及分配给技术创新的余额。不幸的是，这种余额总是非常庞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我们仍然缺乏的技术变化来对增长做出解释。经济史学家将 19 世纪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缩小为交通技术(包括铁路，尤其是船运)，把 20 世纪早期的技术创新缩小为适用于诸多工业部门的普遍应用性技术，如电力、内燃机等。在第二个增长阶段，他们强调微电子技术和微生物技术。他们还强调，技术的后期普及比其初始发明更加重要。但对于发明和普及的解释使经济学家偏离了惯常的分析变量而进入到普遍性的社会制度。以一战后的经济滞胀为例，那一时期技术并没有丧失，通讯技术的确仍在发展。但经济学家却说道，那一时期出现了对银行和货币运转调控不足的政治制度失败，太喜欢求助于保护性政策。与此相反，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他们又说道，那一时期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更加良好的政府政策和更加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新型的技术。即使在后来网络技术、微电子技术和微生物技术产品出现之后，极端全球化者仍然认为它们没有带来多大的增长。经济学家现在仍然在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并希望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

治科学家那里获得帮助。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大部分学者沉迷于描述全球化，而不是对之做出解释。简·阿尔特·斯科尔特（Jan Aart Scholte）就是其中一例，他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和理性主义知识这两种结构性力量来解释全球化，这两种力量都是通过其所谓的“行动者的首创精神”——比如技术创新和政府管制——而得到驱动的（Scholte, 2000: 89—110）。然而，这种观点极为模糊。我的观点是，全球化是各种社会群体谋求扩张其集体权力和分配权力以实现其目标的结果，这一过程涉及所有四种类型的权力资源。可能有人认为这依然是一种模糊的观点，但更为详细的内容将会在本卷的各个部分加以铺陈。

许多社会学家把全球化主要看作是经济全球化。戴维·哈维（David Harvey, 1989）把它看作是由于资本过度积累而导致的结果，并且的确证明了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是一个极端全球化者，他提出全球“网络社会”的概念，这一社会通过信息技术革命以及随后资本主义企业的重组而得到塑造。他认为，这一革命使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我们的物质存在到市民社会、民族和自我观念——都发生了改变。他诗意地宣称，通过重构流动的空间（a space of flows）和无时的序列（timeless time），我们的生活基础已经转型（1997: 1）。极端全球化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2000）宣称，资本主义已成为新的全球帝国。在他们看来，由民族—国家所提供的传统秩序现在已被跨国资本主义的影响连根拔起，代之以任何单一权威中心都无法有效监管的、狂浪的超国家资本主义秩序。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体系的支配性驱动力量”——“一个以跨国企业为基础、或多或少掌控了全球化生产的跨国资产阶级正在兴起”（2000: 5；同时可参阅 Robinson & Harris, 2000）。世界体系论者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劳动分工体系：一是以资本集中型生产为基础的核心国家；二是以低技术劳动和原材料为基础的全球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带则处于

两者之间。资本造就了一个高水平整合的全球结构，尽管这一结构的下部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政治多元性。他们说道：在世界体系中，“经济是每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最基本纽带，这些纽带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万物商品化而进行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Wallerstein, 1974a: 390; 1974b: 15)他们求助于地缘政治学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指出当单一帝国处于霸权地位的阶段，世界体系得到最快速的发展。荷兰、英国以及晚近阶段的美国先后处于霸权地位，它们为世界体系制定规则。由于每个国家的霸权都存在起伏，全球化因此也表现得此消彼长(Arrighi, 1994; Arrighi & Silver, 1999)。然而，霸权的出现被归结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功能性需要——经济权力转化为地缘政治性权力。我已在第三卷对此种观点进行过批判。所有这些模式都把全球化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驱动，但实际上只是部分地如此。然而，经济肯定不是人类社会的惟一驱动力。

请注意，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在这些模式中是相对缺场的。我已在第三卷中提出，普通大众在先进国家已经跃上权力的舞台——他们聚焦于城市和工厂，要求公民权利，被征召进群众队伍，并且通过大众意识形态和群众性政党而得到动员。但殖民地国家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那些国家，群众只是刚刚被动员起来。在本卷中，我们将看到一个部分修正过的对比，那就是在那些被模式化为世界南方的国家，那里的群众今天已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在那些被称作世界北方的发达国家，我们则见证了大众权利的深化，表现在民事(civil)、政治(political)和社会权利(social citizenship)方面。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北方出现的某些倒退。当然，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既然大部分聚焦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作者都倾向于仅把注意力放在近几十年和盎格鲁国家，他们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抵制资本权力的能力当会感到失望，同时当会对这些阶级之间存在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感到惊讶才是。我将在本卷中探讨这些问题。

唯物主义已经直面了其传统对手唯心主义的挑战，后者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罗纳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说道，

全球化就是通过意识在这个单一世界中的集中化而形成的压缩世界。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体，是因为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它的，并愿意它以这种方式出现(Robertson, 1992: 8)。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说道：“物质交换是地方化的，政治交换是国际化的，符号交换则是全球化的……从经济和政治(polity)都是文化性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期待它们将会变得全球化”——这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引擎的全球化理论(Waters, 1995: 7—9)。约翰·梅耶(John Meryer)及其合作者也相信，全球化是由世界文化驱动的(Meryer et al., 1997, 1999)。自19世纪以来，一种理性化的世界文化秩序已经出现，体现在塑造了国家、制度和个体认同的各种普遍性模式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秩序已经遍及全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普遍性的模式和制度，形成了所谓的“全球同构”(global isomorphism)的结果。国家本身不是全球化的驱动力量，它们的结构和权威来源于更加广泛的“世界政体”(world polity)，这一政体由具有普遍合法性的各种模式组成，科学研究协会、女性主义团体、标准制定团体和环保主义组织等无数其他非政府组织也采用这些模式。梅耶对这些世界政体/文化为何出现的问题解释无多，但他似乎认为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力量驱动的。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这种模式尽管有其合理之处，但存在着过分夸大之处。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90)、乌尔里克·贝克(Ulrich Beck, 1992)以及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Scott Lash & John Urry, 1994)没有提出这一维度的理论，但在他们晚近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中包含着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反思性”(reflexivity)，那就是我们都清楚自身对于全球的影响，并且根据这种影响来调整我们自身的行为以便形成新的全球行动规则。他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行动中，观念具有一种不同的回溯性功能。我们时刻监控着变化对于我们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同时定位自身在那个更大过程中的位置。在他们看来，不再有人能够在家中感到心安理得了。我不知道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人类是否一直就拥有这种反思性？抑或它实际上只是对

我们这个新奇时代的焦虑？无论如何，我们的确需要这种反思性来理解潜在核战争和环境破坏等回龙镖效应。所有这些论点都与唯心主义——一种把意识形态和观念看作是流淌于社会之上的倾向——的传统缺陷一样存在不足。我更认为意识形态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对终极意义的寻求。

大部分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之流都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过程。随着其所宣称的经济或者文化秩序充斥全球，从此便形成了一种单一的世界秩序、世界社会、世界政体、世界文化或者世界体系。除前文所提到的作者之外，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把全球化看作是“把世界人口整合进一个单一世界社会或者全球社会的各种过程”(Albrow, 1996)，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认为，世界已越来越成为受同一种力量主宰的单一场所，通过其所谓的“唯一性”联系在一起(Tomlinson, 1999: 10)。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Holton)承认，全球化的确是多元的，但他认为“这种多元性中包含着一个把所有要素都联系成独立整体的单一性人类社会世界”(Holton, 1998: 2)。正在形成的单一全球体系观念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圣西门、孔德、斯宾塞，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全球化作了最大胆的表述。吉登斯抵制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同时包含整合和碎片化的不平衡发展过程”(Giddens, 1990: 175)。我赞同其观点。

少部分作者则采用韦伯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三维度的模式(Osterhammel & Petersson, 2005; Waters, 1995)，这是一种最接近于我的观点，尽管我把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关系分离开来。后现代主义者则走得更远，他们抵制这种“宏大叙事”，认为社会本身是无限复杂和无法说明的。他们有时甚至转向混沌理论或者相对论，强调全球不连贯性、混沌性和碎片性。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列举了各种形式的“流动的、不规则的和/或不连贯的”全球化景象，包括“民族景象”、“媒体景象”、“技术景象”、“金融景象”和“意识景象”等(Appadurai, 1990)；简·内德温·皮特西(Jan Nederven Pietersee)把全球化